

CHAOYANG
LISHI YU WENWU

朝阳历史与文物

朝阳市博物馆
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



CHAOYANG LISHI YU WENWU



ISBN 7-5610-3170-X



9 787561 031704 >

ISBN 7-5610-3170-X
K • 294 定价: 25.00 元

序

朝阳是我国北方地区一个重要历史文化区。它所在的辽西丘陵山地以西南至东北走向的努鲁儿虎山和松岭山脉为屏障，有大凌河和老哈河及其支流贯穿其间，由此东隔医巫闾山与松辽大平原相毗邻，西越燕山山脉可直达华北大平原，北经内蒙古赤峰地区的西辽河流域通往蒙古草原直至欧亚大陆，南以渤海为出海口与东北亚广大地区相联系。独特的地理形势形成稳定而不封闭的文化环境，吸引了历代不同经济类型、不同文化传统的古文化到这里汇集，使朝阳地区的历史文化具有连续性强、内涵丰富、典型而又多样化等诸多特点。

朝阳地区一直是我省文物考古工作的重点市。在 50、60 年代工作的基础上，从 70 年代起，朝阳地区的文物考古工作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重大考古成果的连续报导、重要学术课题的不断提出和大规模文物普查、保护、维修工程的迅速开展，已可以将这短短十几年的工作分出几个各具特色又相互衔接的阶段，即 70 年代；1979—1982 年；1983 年至今。

70 年代工作的重点在青铜时代。北票丰下和建平水泉的发掘是 70 年代在朝阳地区进行的两次规模较大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所获成批资料表明，时代上限可早到 2000BC 以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在朝阳地区分布十分密集，文化堆积丰厚，这是朝阳地区历史上空前繁荣的一个时期，说明在夏到早商时期，辽西地区有一个与夏为伍的强盛方国，它们同步发展，相互影

响,并可能与商文化的起源有关。继 50 年代初喀左县马厂沟以燕侯盂为代表的西周窖藏铜器群发现后,从 1971 年起,在马厂沟附近的大凌河川两侧,又接二连三地发现了北洞、山湾子、小波汰沟商周窖藏铜器群,其中已有明确的商器发现,喀左和尚沟、朝阳魏营子还发现了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墓葬和随葬的青铜器,这就进一步证实,周初封燕势力直达辽西,是以当地包括殷遗在内的土著民族文化为其背景的。1979 年—1982 年是全省文物大普查时期,朝阳地区作为这次普查的试点市,集中了全省上百名文物干部,发现不可移动的文物点 3000 余处,占全省这次文物普查点的三分之一以上,再一次确立了朝阳地区在全省文物考古领域中的重心地位。著名的东山嘴、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和玉器、朝阳十二台营子西汉柳城遗址、凌源安杖子战国—西汉右北平郡址,都是在这次大普查中发现和被确认的。这次文物普查的成果也为明确朝阳和全省文物保护、考古研究的重点项目,提供了科学依据。在这次文物普查基础上,从 1983 年起,朝阳地区的文物考古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飞跃阶段,这一新阶段的开始是以 1983 年夏在朝阳召开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座谈会和 1983 年秋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发现为标志的。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在这一阶段考古大发现的前夕亲赴朝阳和东山嘴遗址现场,并在讲话中预言:朝阳在辽宁省范围内是一个地区,在燕山南北这一块块中只是一角,在这个大范围内,有它的特殊性,它是联结北边昭盟跟燕山南侧的重要环节,又是联结燕山南北这一大地区跟辽东、东北、东北亚地区的重要环节。包括朝阳地区在内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又是联结我国中原与欧亚大陆北部广大草原地区的中间环节,在我国古代文明缔造史上占有特殊地位或作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不仅秦以前如此,就是以后,从“五胡乱华”到辽、金、元、明、清,许多“重头戏”都是在

这个舞台上演出的。就在这次朝阳会议和这个讲话后不久，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址群被全面发现。牛河梁这一 80 年代中国重大考古发现，提出了中华 5000 年文明起源和古文化古城古国出现、辽河文明先于黄河文明、五帝传说及其在北方地区活动的可信性、东西方古文明的比较与相互关系、中国文化传统溯源等中国古史一系列带有突破性的重大课题，这一发现的影响已远远超越考古历史界，扩大到文化史、思想史、美术史、建筑史、宗教史等研究领域，并引起社会各界和海内外炎黄子孙到这里寻根问祖，其势头正方兴未艾，持续不衰。朝阳地区文物考古工作这一新阶段的又一标志是“三燕考古”的提出。从公元 3 世纪前后起，随着秦汉大帝国的解体，周边民族纷纷建立国家，建都于今朝阳市的鲜卑族慕容氏就是在北方建立国家的草原民族之一，与之有关的是，随着骑马民族的兴起，联结东西方的北方草原丝绸之路进一步活跃起来，当时西亚地区的东罗马帝国、萨珊王朝和中亚诸国的诸多先进文化因素，如金步摇冠、玻璃器等，就是通过这条草原丝绸之路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而朝阳地区是必经之路。近年，随着朝阳市郊到北票境内大凌河中游两岸三燕时期墓葬的发现、龙城遗迹在朝阳老城内线索的不断扩大，以及朝阳北塔维修中三燕和北魏佛寺遗迹的发现，表现出鲜卑族在接收中原文化的同时，大幅度吸收中、西亚文化因素，形成多采的“三燕文化”，并对高句丽和朝鲜半岛新罗诸国以及日本的古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有力地证明，在公元 3—5 世纪东西方文化频繁交汇中，朝阳地区既是草原丝绸之路东端的起点，也是东北亚地区的重心所在。此外，最近几年，距今 1.2 亿年前后晚侏罗纪—白垩纪的鸟化石在朝阳县和北票县连续被发现，它们具有代表不同发展阶段、成群和多形态等特点，其中时代最早的标本已相当于著名的德国始祖鸟，从而为研究在恐龙灭绝过程中鸟类的起源提供了迄今世界上最丰富的一批科学标

本,也表明朝阳地区不仅在人类社会发展史、而且在自然演变史上也占有重要位置。

朝阳地区文物考古工作的丰硕成果是地方各级领导、基层干部、广大群众和专业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这里丰富、多样而典型的文物遗存还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文物考古工作者的一块沃土。1972年北票丰下遗址发掘和1979年朝阳、喀左、建平三县文物普查试点时所举办的全省文物干部培训班学员,现在大部分已成为全省各地的文物行政领导和业务骨干。走遍了朝阳大地的广大文物考古工作者,对朝阳的山山水水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同朝阳的干部群众一起在思考一个问题,世界古文明的发祥地,由于过早过量的开发,使植被减少、气候干燥、水位下降、土壤沙化,最终造成近代的衰落,如何发挥文物优势,为朝阳地区创造现代文明作出贡献?可喜的是,古代繁荣与近代贫困这一矛盾的统一过程,体现为文物有效保护合理利用与自然环境恢复的相互促进这一跨世纪的世界潮流,正在被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块有着深厚历史土壤上的朝阳人所理解、所接受,以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和朝阳市郊三燕遗迹为重点的全市文物事业的总体规划,都坚持了既保护文物本身更注重历史环境保护的原则,就很说明这一点。朝阳市博物馆在这个时候编辑和及时出版《朝阳历史与文物》一书,对系统了解朝阳历史、增强全社会保护文物的意识、开展爱国主义和热爱乡土的教育,以及从对历史发展进程的科学总结中寻找今后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规律和特点,都会有积极意义的。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首先走一步,可与世界诸文明古国相媲美的朝阳地区,必将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谐调结合的新姿,面向全国,走向世界,跨进21世纪。

郭大顺

1995年11月24日

目 录

序	郭大顺
---------	-----

第一章 朝阳历史概述	1
------------------	---

第一节 原始时期的朝阳	1
第二节 夏商周春秋时期的朝阳	6
第三节 战国秦汉时期的朝阳	11
第四节 魏晋时期的朝阳	16
第五节 北朝时期的朝阳	23
第六节 隋唐时期的朝阳	27
第七节 辽金元时期的朝阳	33
第八节 明代的朝阳	41
第九节 清代的朝阳	44

第二章 重要考古发现	51
------------------	----

第一节 原始时期	51
第二节 夏商时期	57
第三节 商周青铜器窖藏	65
第四节 西周春秋时期	69
第五节 战国秦汉时期	74
第六节 魏晋时期	77

第七节 北朝时期	82
第八节 隋唐时期	88
第九节 辽代	92
第十节 金元时期	102
第三章 名胜古迹	109
第一节 山川	109
第二节 长城和城址	116
第三节 古塔	132
第四节 寺庙宫观	147
第五节 其他	163
第四章 馆藏珍品	166
附 录	212
朝阳历史沿革表	212
后 记	213

第一章

朝阳历史概述

朝阳背枕大漠，前临辽西走廊，东接辽河平原，西连华北平原，是古代东北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占有重要的地理位置，而且大、小凌河、老哈河流域山谷相间，土质肥沃，水草丰茂，宜于耕牧。早在十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此繁衍生息了，并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此后，山戎、东胡、乌桓、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都曾逐鹿辽西，与汉族人民共同谱写了朝阳的历史篇章。做为三燕故都、隋唐重镇所在的朝阳地区，不仅是人类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而且也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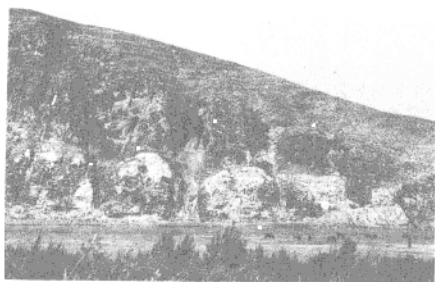
第一节 原始时期的朝阳

原始时期指夏以前人类社会的历史，也就是考古学上所说的旧石器时代，大约始于180万年前。云南省元谋上那蚌更新世早期地层中出土的“元谋人”牙齿化石，是我国境内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早期直立人化石，距今大约170多万年。朝阳境内时代最早的人类居住址是喀左县的鸽子洞，发现有早期智人化石和打制石器，距今大约10多万年。到距今5000—6000年的红山文化时期，辽西地区成为发出照亮中华大地第一道文明曙光的地源地。

朝阳人类历史的序幕

鸽子洞位于喀左县水泉乡大凌河西岸唐山峭壁上，是经地下水长期溶蚀而形成的天然石洞。因洞中多有鸽子栖息，故俗称鸽子洞，这未免有些喧宾夺主，其实人类才是这里最早的主人。

鸽子洞居高临水，洞口高敞向阳，洞深15米之多。周围低缓的山坡上十多万年前覆盖着大面积的森林，河谷盆地则生长着茂密的草丛，披毛犀、最后鬣狗、虎、狼及羊等数十种动物出没于森林草丛之中。



鸽子洞全景

对于原始人来说，这里既可以栖身，又有可供狩猎、采集的对象，并且得水源之利而又能避其害，具有得天独厚的生存条件。白天他们出没在森林草地之中，追捕野兽，采集野果；晚上回到洞内，燃起熊熊篝火，围坐在一起烤吃猎获的野物。

当时的社会处在母系氏族公社初期，以一个女祖母为核心，“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国家、法律、道德、婚姻、家庭还不知为何物，他们所知道的是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抵御野兽的侵袭，获得生存。社会分工极为简单，男子主要从事渔猎生产，而女性则主要从事采集、抚养孩子，氏族成员共同劳动，平均分吃食物，过着原始共产生活。但是这种原始共产生活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浪漫，而是非常艰苦的。疾病、野兽时刻都在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种植农作物、

饲养家畜还没有被发明，仅靠渔猎和采集来维持生存。使用的工具也只有经过简单加工的石器和木棒，只有一些小动物和生性温驯的羊才有时成为他们的战利品，食物来源无法保障。

鸽子洞人使用的石器都是用就地选择的石英岩、燧石、石灰岩打制而成，大体可分为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三种。靠这些简陋的石器来维持生存，现在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但这确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鸽子洞人早已学会用火、保留火种，而且可能掌握了取火技术。火的发明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火作为生产力，是人类进行生产活动、改进工具、提高生产效率的有效手段。有了火人类可以吃到熟食，脱离了“茹毛饮血”阶段。这样，不仅扩大了食物来源，还可以减少肠胃疾病，有益于人体发育。有了火还可以照明取暖、驱赶野兽。根据鸽子洞内出土的耐寒的岩羊、披毛犀等动物化石判断，当时辽西地区的气候是比较寒冷的。而那些如虎、狼等食肉类动物不仅不能成为鸽子洞人的战利品，反而是时刻威胁他们生命安全的敌人。鸽子洞内熊熊燃烧的篝火，则可以保证鸽子洞人顺利度过寒冬，并使那些凶猛的野兽望而却步，使他们得以生存下来，拉开了朝阳人类历史的序幕。

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即距今二、三万年时，建平、凌源等地也都有了人类，他们仍然过着那种渔猎、采集生活，但经过长期的劳动、进化，其体质特征已经与现代人没有太大区别了，而且思维也得到了发展，为以后发明农业、制陶，定居下来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文明的曙光

大约距今一万年前，人类经过千万次的发现，终于学会了种植作物和制造陶器，从而在河边台地上定居下来，开始了考古学

上所说的新石器时代。

分布在燕山以北,大凌河、老哈河上游一带的红山文化就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们创造的一种农耕文化,距今约五、六千年前。红山文化是因 1935 年最早发现于赤峰红山后而命名的。

红山文化时期,农业生产是主要的经济来源,种植的作物主要是谷类,同时辅之以渔猎。金属工具还没有应用到农业生产,磨制石器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生产力水平较低。但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母系氏族公社可以把众多的劳动人手组织起来进行大规模的协作,因此,当时的经济,尤其是农业还是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当时朝阳的气候比较温暖,降雨较多,农耕条件良好。人们使用简陋的石斧砍倒树木,然后用火焚烧,开辟出可以耕种的田地,这就是原始的“刀耕火种”。当时翻土用的工具是一种磨光石犁,这种大型翻土工具的发明与应用,说明农业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农业的发展为家畜饲养业奠定了基础,猪是当时主要家畜之一。适应农业、畜牧业的发展,手工业也发展起来了。陶器是定居农业必需的生活日用品,因此制陶业是主要的手工业部门。陶器都是采用泥条盘筑法制成,种类有罐、盆、钵、瓮及筒形器,烧成温度均在 900℃ 以上。由于陶器的用途不同,在选料上也有所区别,用于盛物的盆钵类多用经过淘洗的细泥制成,不仅质地坚硬细致、不易渗水,而且美观耐用。做炊煮用的罐类则是泥中夹砂,使其增强受热急变性能,且不致烧裂。和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一样,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也有大量的彩陶。所谓彩陶就是在未烧制的陶坯上用呈色剂绘出图案,经高温烧成之后,呈现出不同于陶胎的颜色。仰韶文化的彩陶图案多以玫瑰花为母题,红山文化则以龙纹、鳞纹为母题。因古人席地而坐,所以图案又都绘在器物的上半部,即最容易看到的部位。这些彩陶已经不仅仅是供人使用的实用品,而且也是供人欣赏的艺术品。除制陶之

外,人们还要制做大批的石犁、石刀、石斧、石铲、石磨盘、磨棒、骨刀、骨锥等用于生产、生活。玉器的制做也是当时手工业的一个重要门类,不论是在制做技术,还是整体造型,都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既有写实的龟、鸦、鸟,又有抽象的龙及勾云形玉佩饰等。陶塑在当时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东山嘴与牛河梁出土的孕妇像和女神头像,比例准确,造型生动,都是当时的杰作。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到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已经创造、积累了大量财富。个人的劳动所得除满足自己生活必需消费之外有了剩余,使一批劳动力可以脱离农业生产,从事手工业或其他行业,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由于财富的积累,使氏族成员之间原来平等的关系也因占有财富的多寡或从事职业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那些氏族首领有条件占有众多的财富,从而逐渐成为统治者,而那些没有财富的人则沦为贫民或奴隶。尽管同一氏族的人们死后还要葬在同一个墓地,但位置有了主次的区别,而且随葬品的数量也相差悬殊,如牛河梁积石冢居于中心的大墓,即氏族首领的墓葬,多随葬精美的玉器,一些从属的小墓则一无所有。

古人对自然界的了解甚少,加之生产力水平低下,无法把握自己和本氏族的命运,所以很自然地把自身及本氏族的繁衍、兴衰等无法理解的现象同自然界的一些因素联系在一起,从而产生了原始宗教。红山文化时期,已经超越了最初的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阶段,发展到了更高级的祖先崇拜阶段,与此相适应的是大型的宗教场所坛、庙、冢应运而生。而且做为中华文明象征的龙也形成了。如吻部前凸、两耳高耸、眼、鼻、牙俱全的玦形玉器,就是高度概括化了的猪首形象,并且与集多种动物于一身、能兴云作雨、主宰人类命运的神异之物——龙的起源有密切关系,它并不是无意识地信手拈来,而是被赋予了特殊而神秘的意义。

(田立坤)

第二节 夏商周春秋时期的朝阳

夏——春秋时期，在辽西即考古学上所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此时辽西地区大部分土地都得到了开发，人口骤增、部族林立、冲突加剧。各部族在频繁的冲突中逐渐融合，形成了山戎、东胡几个大的部落集团，这些大的部落集团与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文化交往，为战国以后郡县制在辽西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大凌河流域的全面开发

夏商(公元前 21——前 11 世纪)时期，包括朝阳在内的广大辽西地区，有一个人口众多、势力强大的方国(或称部族)，考古学上将这一方国文化称之为“夏家店下层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因 1960 年发掘的内蒙古赤峰市夏家店遗址而命名的。据 C¹⁴测定，其年代为距今 4000——3200 年间。这种文化遗址分布极广，北抵西喇木伦河，南达燕山南麓，西及赤峰以西，东至辽河。而朝阳则是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之一，遗址点达 1300 多处，有些地方比现代村庄还稠密。

那时，人们多选择在便于生产和生活的河旁台地或地势较高的平地、山顶上居住。村落面积数千至数万平方米不等，四周筑有起防御作用的土、石围墙。房子有圆形、方形和长方形，由早期的半地穴式发展为地面上建筑。墙体用草泥版筑或土坯砌筑，采用三七错缝砌法，地面抹以白灰，中间有圆形烧面，是为炊煮之处。这种比较进步的建房技术，反映出先民们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生活、居住条件的改善。

农业是当时主要的经济部门。作为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物质标志之一的生产工具，有了长足的进步。仍以磨制石器为主，

但种类明显增多,分工更细,形制更趋于科学合理。如:用于伐木垦荒的磨光石斧、锄草翻土的扁平石铲、刨地的有肩石锄、收割禾穗的安柄石镰和梭形石刀等等。生产工具的进步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扩大了耕地面积,促进了农业的发展,那时人们种植的谷物有粟、黍和稷三种,即俗称的谷子、大黄米和高粱。作物品种的增加不仅丰富了人们食物的种类,而且还使粮食有了较多的剩余。建平县水泉遗址的房子周围都分布着袋状窖穴,有的还存留炭化谷粒,据计算,其中最大的一座窖原存谷子四千多公斤,数量之多,令人吃惊。

在农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畜牧业也有了显著的进步。这突出表现在饲养动物种类的增多,有猪、鸡、牛、羊、犬、马等,可谓“六畜”兴旺。渔猎和采集经济作为人们谋取生活资料的补充手段而继续存在。

手工业与农业分离,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陶器是当时的主要生活用具,因此制陶业在手工业部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烧窑技术稳步提高,熟练地掌握了高温(1000℃左右)下的铁素还原技术,烧制的陶器呈灰黑色,质坚耐用。在手制和慢轮修整的基础上,发明了快轮制陶技术,陶器造型规整,表面或磨光,或饰以绳纹、划纹、附加堆纹,或饰彩绘图案,构思巧妙,新颖艳丽。陶器种类明显增多,凡是日常生活所需的,如炊煮器鼎、鬲、甗,盛器瓮、盆、罐、豆、碗,酒器爵、杯、盅等等,无不具备。

其他手工业也都有很大进步。石器根据其用途采用磨制或打制,种类有斧、铲、凿、镑等。利用动物骨骼制作铲、锥、凿等。纺线、织布、缝制衣服的纺轮、骨梭、骨针等工具都已齐备,特别是骨针,大小与现代的钢针相似,可见工艺水平之高。丰下遗址一墓葬人骨上附有黄色平纹布痕迹,每平方厘米经、纬线各10条,推测应是用原始织布机织成的麻布衣。根据我国有悠久的丝织业历史来看,那时也可能发明了养蚕缫丝业。人们虽然早已经掌

握了青铜冶炼技术，但铜器使用还并不普遍，仅限于一些小件兵器和装饰品。

建平水泉和喀喇沁等遗址发现了口簧琴、陶埙、石磬等乐器。口簧琴为骨片制成，中间有一条舌簧状骨片，厚不足一毫米，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口簧琴实物。埙为陶土烧制，椭圆形，中空，有吹孔和音孔，此即《诗·大雅》中“如埙如篪”的埙。石磬作三角形，上端有悬孔，它是一种古老的打击乐器，即如古书所载“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此外，还应有用竹、木、革等材料制成的各种乐器，可惜未能保存下来。

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促使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的出现。贝作为货币成为氏族、家族或生产者个人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的媒介。交换是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产物，反过来又推动了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发展，加速了社会分化的过程。

这时，用猪和牛骨占卜、预测吉凶祸福的习俗已很流行，并且有人专门从事这项工作。

种种迹象表明，生活在距今四千年前后的朝阳地区的先民们已经跨入了阶级社会的门槛，奴隶和奴隶主两个对立的阶级已经出现了。

辽西古国

约公元前1027年，周灭商。西周初期，为了统治广阔的被征服地区，周王曾大规模分封诸侯，即“封邦建国”。召公奭的长子封在今华北北部和东北部分地区，建立燕国，都于蓟（今北京市），成为周王朝北面的屏障。

从西周到春秋，直至战国中期，辽西地区居住着孤竹、东胡、山戎几个族群。有关史料记载颇多。《管子·小匡篇》载：“（燕）北至于孤竹、山戎、秽貉。”《史记·匈奴列传》云：“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

一。”

孤竹国是商的同姓国。周灭商后，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和叔齐，因反对武王伐纣，决心不食周粟，结果一同饿死在首阳山上。有学者考证，首阳山当在辽西，若此，则应在今喀左县境内。孤竹在西周、春秋时期一直存在。公元前 668 年，山戎攻燕，燕求救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制令支，斩孤竹（《管子·小匡篇》）”，杀死国君答里呵，孤竹国才被灭亡。

山戎和东胡是商周时期居住在东北地区西南部的两个族群。山戎在今大、小凌河流域，南至燕山一带，与孤竹和燕国相邻。山戎的军事力量比较强大，常常南侵攻燕。齐桓公亲率大军，联合燕与无终国，共同征伐山戎，山戎败北，其残余势力被赶到东北大荒原去了。

山戎北窜荒漠后，原来居住在西喇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今赤峰地区和朝阳西北部）的东胡族乘虚而入，把势力扩张到大、小凌河流域。东胡族由于长期不断地吸取中原的先进文化，经济和军事力量都有较大发展，因而为了争夺土地和财产，经常与燕、赵两国发生冲突。在考古学上，将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称为“夏家店上层文化”。其遗址多分布在河旁台地或丘陵上，也有在高山顶上的。村落面积不大，周围往往砌筑石围墙，起防御作用。

作为生活用具的陶器，种类较少，有瓮、盆、罐、鼎、鬲、碗、豆等，皆手制，夹砂，呈红褐色，多素面无纹饰，制作较粗糙，器形亦不甚规整。在制陶技术上，远不如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先进，显示出两种文化并无前后接续的承继关系。

生产工具仍然以石制为主，多数用于农业生产。其中有磨制的锤斧、石铲、扁平穿孔石斧、半月形双孔石刀、研磨盘、研磨棒、石臼、石杵等，用于劈砍、锤砸、翻土、锄草、收割、磨米等。房子附近有储存粮食作物的圆形袋状窖穴。谷子、大黄米、高粱、蓖麻子等是当时主要作物。由此可见，农业生产技术是比较先进的。除